

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

——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

陈凤兰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 福建 福州 350108)

[关键词] 田野调查; 南非; 新移民; 文化冲突; 适应策略; 跨国移民

[摘要] 论文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 选择南非的中国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 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的概况, 阐释了中国新移民在南非遭遇的文化冲突以及他们的适应策略。研究发现, 中国新移民在基本价值、家庭观念、消费观念等方面与南非人有明显的冲突, 新移民群体对“南非文化”持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具体体现在居住区域、社会交往和通婚等方面。同时, 同质性强的中国新移民身处介于同质与异质之间的社会空间, 对南非文化仍有明显的隔阂。

[中图分类号] D634.34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1)03-0041-09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Adaptation by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Groups

—— A Case Study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South Africa

CHEN Feng-lan

(Sociolog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Sociology Depart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Key words: field work; South Africa; new immigrants; cultural differences; strategy for adaptation; translational immigration

Abstract: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values, family concepts and consumption habits,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native South Africans do not see eye-to-eye on numerous issues in daily life. As a result of these difference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keep their community segregated from the local society by ethnic ghettos, exclusive social networks, and endogamy. The article was based on its author's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during her field work i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收稿日期] 2011-03-10; [修回日期] 2011-07-27

[作者简介] 陈凤兰(1980-), 女, 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研究方向为移民、族群、跨文化比较研究。

* 感谢李明欢教授为笔者提供了前往南非调研的机会, 使笔者能够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新移民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有意义的理论构想。如李明欢在《欧洲国际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1]和《东欧社会转型与东欧新华商群体的形成》^[2]中以中国的新移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移民输入国的政策对中国新移民的影响;庄国土关于福建新移民的研究有一系列的文章——《对近20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3]、《从跳船者到东百老汇大街的“主人”——近20年来福州人移民美国研究》^[4]等,从移民动机、移民条件、移民现状等方面对福州地区的新移民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此外,张秀明探讨了移民的概念、类型与流向;^[5]黄润龙主要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海外新移民的数量及其分布特点;^[6]郭玉聪探讨了新移民对中国和移入国的积极作用。^[7]

上述研究成果侧重从新移民群体的迁移原因、迁移经历、迁移特点及其对移民输入国所产生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建构跨境迁移的相关理论,笔者从中获得重要启发:不管新移民的迁移动机、迁移方式是什么,其迁移事实都将对输出地和输入地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影响,也可能是对当地社会文化的间接影响。

然而,在建构的视角下,上述研究成果普遍忽视了跨境迁移群体在进入迁移地后所面临的来自不同文化的冲突问题。本文以南非的中国新移民为研究对象,分析文化冲突与跨境迁移群体的适应问题。之所以选择南非新移民这个群体,是因为虽然非洲并不是中国移民传统的移民目的地,但南非近年来却倍受中国大陆新移民的青睐,大陆新移民增长迅速,而国人对这一国家的了解并不多;国内媒体和学者主要侧重从经济层面来分析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对非洲新移民群体的关注较少,且很多研究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非洲各国国情、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无视中国新移民在非洲不同国家所面临的具体文化冲突。南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从地理位置上看,南非毋庸置疑是一个非洲国家,但其在历史上经历了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长期殖民统治,这些西方殖民国家在南非创造了一个多板块式的欧洲文化。^[8]南非独特的种族背景、多元的文化传统、动荡的社会治安状况以及诱人的商机,使得在这个国度生存与发展的中国新移民处于矛盾的情感之中。他们不像在欧美以及东南亚的中国移民那样秉持“落地生根”的态度,却又在处处充满商机的南非流连忘返。因此,南非中国新移民的跨文化适应策略具有与其他地方新移民不一样的特点。对该群体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对华人新移民的认识。

本文基于笔者在中国和南非两地的田野经验以及对南非中国新移民动态的追踪调查展开分析。从2010年7月到2011年3月,笔者先后三次深入南非新移民主要输出地——福建省福清市进行田野调查;其间,笔者于2010年12月到2011年2月在南非中国新移民最集中的三个城市——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德班进行田野调查,主要运用参与观察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在南非生活的大陆新移民进行调查。调查期间,笔者在福清地区入户访谈,倾听当地民众选择移民南非的原因、经历、海内外互动等问题;在南非,笔者居住在华人家中,一方面细致观察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在访谈中倾听他们的心声,围绕着他们的迁移经历、社会交往、文化适应、族群关系、身份认同等问题,对近50位中国移民进行追踪访谈。被访者包括1980年以后迁移南非的新移民、新移民子女、留守家庭成员以及部分侨领(南非福建同乡会、南部非洲和平统一促进会、南非中国工商联总会等社团领袖)。此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批发商城田野调查时,笔者也对8位南非人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与评价。

文化在不同群体和共同体内体现为特定的习惯、习俗、礼法、规约,经过历代薪火承传,久而久之就成为传统。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刻都发生、发展在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情境之中,每个人的行动时时处处都要受到文化的内在指引和制约。^[9]作为跨越国境的迁移群体,南非的中国新移民在跨境迁移后所面临的是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化氛围,无论是微观的个体内在心理体验,还是宏观的群体文化适应,都存在着一个调适的过程。他们选择的适应策略,直接

影响了这个群体在移民输入地的生存、发展与融合状况。

一、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概况

华人移民南非始于 17 世纪，主要是来自中国广东省和东南亚的自由移民以及荷属东南亚殖民地流放的华人。早期南非华人移民数量并不多，到 20 世纪初在南非定居的华人不到 2500 人。^[10] 二战结束后，南非的中国大陆新移民逐步增多，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陆新移民迅猛增加。据南非福建同乡会秘书长估计，目前在南非的大陆新移民人数约为 30 万人，其中福建新移民最多，大概占南非华人总数的 30% 左右。^[11]

中国新移民在南非以经商为主，从事零售、批发生意，经营商品包括服装、鞋帽、箱包、眼镜、布料、五金等，还有做进出口贸易、开餐馆等。从事商贸活动的华人分两类：一类是国内各大公司派驻南非的商务代表，另一类是个体私营者。约翰内斯堡是中国新移民的聚集地，集中了南非 60% 以上的华侨华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约翰内斯堡陆续兴建了很多批发商城，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城、香港城、百家、中国商贸城、中非商贸城等。这些批发商城看上去与中国国内的小商品市场没有任何区别，其中的商铺差不多 90% 以上为中国人所拥有，从事批发零售行业成为大多数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职业。这些商城的批发生意辐射到南非周边国家，包括莱索托、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国；而华人开办的零售商店、餐馆更是遍布南非各大小城镇。

如果说中国新移民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西欧等地作为低层次的劳动力填补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空缺，那么在南非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新移民则构成了当地商业流通的一个环节，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以约翰内斯堡的中国批发商城为基础，辐射南非各地以及周边国家的少数民族经济（the ethnic economy）。这种少数民族经济的表现形式，大多以批发商、零售商、雇员及小规模贸易商为主，同时还包括由这一群体经营的生产性企业和服务业。虽然中国新移民大多来自中国的乡村地区，经济能力一般，但凭借对中国市场和商业渠道的了解以及移民网络的支持，新移民能以此在南非的小商品批发零售站稳脚跟，并且把商业活动扩展到南非各个城市甚至是南非周边国家。

二、文化冲突：无所不在

亨廷顿将中华文明中儒家文化的特点概括为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将西方文化特点概括为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12] 从以上概括来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二者相遇时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冲突呢？

在南非，华人形成了一种商业传统和浓厚的商业氛围，在商业中处于一定优势。和南非当地人相比，华人似乎更具有商业意识。虽然南非的商业竞争日益激烈，但与国内相比，在很多受访者看来，南非仍然具有很大的商机。因此，只要头脑灵活、努力工作，凭借着中国新移民网络的支持，新移民在南非可以做到以小本谋大利。新移民在南非辛勤工作，奋力拼搏。以约翰内斯堡两家最大的批发商城——香港城、百家为例，商城全年只放假五天（圣诞节和元旦），而且还是商城强制性放假，否则，估计在这里经商的华人会全年无休。这种日夜操劳、不注重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与南非民众有很大不同。其实，差异不仅体现在工作方面，受不同文化氛围的影响，中国人与南非人在基本价值、家庭责任感、消费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一）基本价值的冲突

在南非华人群体中有句流行很广的话——“不赌不是华人，不偷不是黑人”。言下之意，华人好赌，黑人惯偷。“黑人偷东西很正常。我以前开店的时候，货刚刚摆上去，店里的黑人工人

就把东西给偷了。如果被我发现，我会叫她赶紧拿出来，她也就满不在乎地拿出来了。他们黑人偷东西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没什么，不像我们中国人，如果偷东西被当面抓到了会很不好意思，他们却能若无其事。还有，黑人可能会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打扮很体面的样子，然后找你讨要五元、十元去买可乐、买吃的东西。如果是中国人，我们就开不了口。”^[13]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商城的调查过程中，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盗窃损失是在当地经商的华人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情，而很多人将之归结为南非人的“劣根性”。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盗窃问题即使在国内也并不鲜见，并不能将之归结于一种国民性格。但在道德感、羞耻感方面，中国人与南非人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与评价。

受访者曾先生从南非人的宗教和教育角度着手分析“黑人偷窃”现象。“这（偷窃）跟他们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环境和教育水平有关系。他们（黑人）觉得你有钱我也应该有，比如说我前几年雇佣了一个黑人司机，他跟了我好几年，人挺好的。但是他讲的有些话就很可笑。他会说你们中国人那么有钱，我们黑人没钱，你们应该把你们的钱分给我们。我回答说‘为什么要分你呀？你们黑人那么懒惰，整天吃啊喝啊玩啊，我们中国人辛勤工作，在节假日也不休息，很辛苦才赚来这么多钱。为什么要分你？’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赚了钱，就应该大家一起享用。财富都是上帝给的’，他们就是这种观念。他们的思维有种‘共产’的意思。在他们宗教里面，他们认为上帝给每个人的东西都一样，今天给你多给我少，你要分我一些；要是明天我的多了你的少了，我也可以给你一些。他们就是这种思想，如果你没钱买吃的找他们要，他们也一样会分你的。我觉得这种思想蛮好的。但这种思想会导致他们懒惰。总之，他们的性格跟我们中国人完全不一样。”^[14]曾先生具有大专文化程度，1997年来到南非，出国前他曾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来到南非以后从摆地摊开始做起，现在拥有自己的公司，从事中国与南非之间的贸易往来。说起南非人，他有很多感触，比如白人的傲慢、冷酷、修养、专业，黑人的懒惰、偷盗、乐观、善良。在南非生活了十几年，他的英语非常流利，能与带有南非口音的黑人、白人交流。但他的交往对象仍以华人为主，因为“实在是不能适应南非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

陈向明在其研究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的著作《旅居者和“外国人”》中指出，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冲击的强弱，其明显程度往往与家乡文化和东道主文化的差异大小成正比。^[15]中国文化与南非文化完全不一样，新移民在这里感受到的不适应，是他们接触异质性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对于不同生活习俗的不适应状况通常都是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被弱化的，如前所述，曾先生就尝试着从宗教、社会环境来看待黑人的“盗窃”问题。

（二）家庭观念的冲突

中华文化极其强调家庭观念与集体主义观念，这与西方文化强调的个人主义完全相反。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下长大的中国人，较普遍地认为集体共同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

“我们中国人家庭观念很强，大家都活得很累，就是为了家庭。像我现在如果回国去了，只要我不乱花钱，现在赚的钱还是够我用几十年的。但是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发展起点，我还要在这里继续打拼。我们（中国）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像我这样在南非待十几年的，谁没钱？我们在老家也会做慈善，如果老家要修建寺庙，或者其他慈善性质募款，我都会捐钱的。毕竟我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最终都要落叶归根的。在这里的（中国）人都这么想，老了以后肯定要回去，守着一亩三分地养老去。然后把自己的财富给子女，他们就可以不要像我们这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中国人满脑子都是想着赚钱，大家出国不都是为了赚钱吗？”^[16]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家长习惯为子女积累财富，因此，即使赚到钱了，也尽量省吃俭用。南非的中国新移民群体，虽然很多人在这里积累了财富，但在唐人街、商城里面，如果要根据人们的衣着打扮、出入座驾判断一个人的贫富，那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节俭、低调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

“我喜欢黑人，他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虽然他们没什么钱，但真的很快乐。黑人不像中国人，总想着为名得利、为孩子存钱，很辛苦。黑人每天都为自己而活，很开心。而且黑人心胸很豁达，这么多中国人到他们的地盘上赚钱，他们也能接受。这一点很值得中国人学习。”^[17]

家庭观、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与南非人在其他方面，如婚姻观、消费观等方面的差异，而这又进一步将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群体区别开来。

（三）消费文化的冲突

在笔者的访谈和调研中，很多受访者谈到了这一点——南非人的购买力很强。当地人天性乐观，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喜欢消费，而且购物爽快，不像中国人那样精打细算，因此整体购买力非常可观。

“这里的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每天都在逛街买东西。你看商城里面每天这么多人，真正来打货（拿批发）的人周五、周六比较多，其他时间都是零售顾客。他们每次来都大包小包的买，买东西很爽快，尤其是女性顾客，看中了衣服就买，连试穿一下都不用。我们中国女人哪有整天在街上逛街买衣服？如果真这样子，肯定要被看作有病。”^[18]来自福建福清农村地区的林先生这么说，在他眼里，逛街购物是不务正业，每天消费更是不可理解。虽然林先生看问题、看事情带有很强的主观偏见，却有一定的代表性。的确，倡导勤俭节约的中国文化从来都不鼓励积极消费，即使在政府极力想要拉动国内消费的今天，中国民众的储蓄额仍然每年都在升高。

“圣诞节前，我给店里的几个黑人工人各发了1500兰特的工资加奖金，他们立刻在商城买了很多衣服、玩具、化妆品，还买了个旅行包装东西带回去，身上只留20兰特作公交车路费回家去。黑人就是这样，有多少花多少，完全没有储蓄观念。我们中国人再怎么着，也不敢把钱都花光呀。”^[19]

“黑人有钱就花，比如说拿了工资吧，月头大手大脚花，等月中的时候，算一算留点钱撑到月底，然后都花光了。黑人没地方借钱，大家都不敢借钱给他们，因为借了就没了，他们都不还，也没钱还。他们都是有钱就花。”^[20]

在约翰内斯堡香港商城做保安工作的南非小伙子 Johan 告诉笔者：“中国人真的非常勤奋非常能吃苦，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他们几乎不休息。其实他们很多人已经很有钱了，但还是很节俭很努力，南非人跟他们比，确实很不一样。”^[21]

“中国人好像都不喜欢消费，他们很少放假休息，像一部永远都不停止的机器，一直都在工作。”^[22]

南非当地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即使是黑人，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有福利保障，这也养成了当地人没有储蓄观念、有多少花多少的消费习惯。

三、适应策略：保持距离

跨文化适应的目标是居留者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增强，体现于对异文化模式的认知、选择和接受能力以及与异文化成员的交往能力的提高。文化适应的进程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受行为者主观心理因素的限制。不同个体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阶段性差异明显，其结果也有很大不同。

中国人旅居国外，无论是经商还是学习，都意味着要离别熟悉的家人朋友，放弃习惯的生活及语言环境，接受他们不是很熟悉和了解的异国文化。文化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良好的文化适应有利于良好的互动，更有利于外国人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在南非生活的中国新移民跨越了边境，他们一方面在异国他乡过着一种体现自己主体性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移民社会又不得不面对各种风险。在文化的冲突下，他们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应当地文化的策略。总体而言，新移民群体对“南非文化”持一种“保持距离”

的态度。这体现在居住区域、社会交往和通婚等方面。

(一) 居住区域首选华人多的地方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南非的新移民群体集中居住的现象非常突出。约翰内斯堡的 Bruma, Cyrilldene, Edenvale, Bedfordview 等地区是中国新移民最为集中的区域。虽然也有受访者表示,在华人集中的区域人多嘴杂,是非较多,喜欢选择远离华人的住宅区居住,但更多的人表示喜欢居住在华人多的区域。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 2003 年左右,约翰内斯堡地区的住宅(面积 1000 平方米的独立 house)的价格大约为 150 万兰特(一万兰特等于 9000 元人民币)。到 2010 年,其他区域的房价稍微有些上涨,然而,约翰内斯堡唐人街西罗町(Cyrilldene)附近的住宅价格已经飙升到 500 万兰特(面积 1000 平米的独立 house),涨价幅度远高于约翰内斯堡其他地方。很多受访者表示,是中国新移民的到来推高了唐人街的房价。

南非华人喜欢集中居住,在当地人看来,就显得有些“自闭”了。据南非华文媒体报道,华人可能平时较少收听南非“702 电台”,该电台在南非媒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电台的记者莉兹·托姆(Liezl Thom)称,在本地人和当地媒体的眼中,总觉得南非华人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很封闭,不爱从自己的圈子里走出来;也许是语言的障碍,大多数南非华人与当地人沟通较少。^[23]

“我们私底下从来不跟当地白人、黑人交往,跟他们当地人玩不到一块。他们在 party 里非常豪放,比如异性之间会勾肩搭背、搂搂抱抱的,这我实在接受不来。”^[24]

“南非人其实很热情,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在路上都会跟我们(中国人)打招呼。刚开始我不太适应这种招呼,我们不习惯主动向别人示好,怕被误会嘛。这几年我逐渐习惯了见到老外打个招呼,但是我身边的华人朋友大多还是不喜欢这样做,我们中国人性格比较含蓄内向,对陌生人也比较警惕。”^[25]

目前在南非经营的大陆新移民迫不急待地致富追求,与南非人享受“悠闲安逸”的生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运作成本,许多华人企业老板自己全家老少不计报酬齐上阵,超时超量工作司空见惯,这与南非当地人较慢的生活节奏完全相反。文化中真正最难以适应的部分,不是社会传统、社会符号或语言的不同,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文化中的大部分个体所有的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交往行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如果没有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长此以往这些方面将一直“不能被理解”。

(二) 社会交往局限于华人圈子

南非当地的普通民众在节假日时,有的会走亲访友、烤肉聚会,或者开车自驾出游。而中国新移民的亲属大都在国内,南非华人数有限,初来乍到的侨胞们认识不了几个人,其中能称作朋友的更少。而受限于语言和文化背景差异,他们也没有办法与本地人建立起密切的交往。

在谈起下班后的娱乐生活时,很多新移民会用“无聊”两个字来形容。刚到南非不久的钟先生告诉笔者,刚到南非的时候,他的亲戚朋友就一再跟他强调南非治安状况的恶劣,提醒他没事不要随便出去逛。“我想出去也不行呀,一句英语都不会说。”而且,来南非不久的他还不会开车,“几公里的路开车一会儿就到了,走路得走上半天。”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娱乐活动对于新移民们来说就变得十分稀有。

平时,几个老乡、朋友在一起打打牌、聊聊天,就是新移民最常见的娱乐方式。虽然有电视机,但因为英语不好,南非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大家听不懂,只能找机会到华人商店租 DVD 来看。在约翰内斯堡百家商城卖 DVD 光碟的林先生说,每部连续剧光碟售价约为 20 兰特,他一个月的营业额可达数万兰特。由此可见,在家看 DVD 已经成为南非华人新移民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了。

移民南非多年的陈先生在约翰内斯堡香港城拥有两间店面，他说自己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朋友圈子很小，主要交往对象都是几个老乡。平常下班后，陈先生通常直接回家，做饭看电视，最多约上几个朋友，去唐人街西罗町中餐厅吃吃饭、聊聊天，或者打打麻将。

在南非，如果要招呼朋友出去吃饭，也是很久才会发生一次的“重大社交事件”。通常朋友聚会也来不了几个人，大家都开车，所以也不敢喝酒，加上当地治安不好，通常晚上9点一过就匆匆散场，很难尽兴。

“南非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夜生活。晚上五点半下班以后，连买东西都没地方买，所有店都关门了。只剩酒吧和赌场，酒吧里面都是黑人。我们在南非天天都在看DVD、聊天、喝酒。所以说生活过得很简单。回国后反倒不习惯。”^[26]

“南非人很文明，开车的人会给走路的人让路，很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华人就差一些，特别是来南非不久的那些人，他们把国内的一些坏习惯带到这里，比如说开车速度太快、不注意避让、违规超车、随意停车等。有时候拿中国人跟当地人一比，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27]

“中国人好像都不需要娱乐活动，我很少看到他们出去玩。工作以外的时间我跟中国人没有太多接触，因为他们好像都没出来玩。”^[28]

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表现出来的共同的行为，还包括这些行为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和传统习惯。从社会交往的观点，可以看出中国与南非人在生活方式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三）通婚 “视频相亲”的兴起

异民族之间的通婚，是考察两个群体相互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反映群体和家庭对通婚的态度。在南非，华人与南非当地人通婚的案例很少，华人普遍还集中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结婚对象。

在福清的调查中，笔者听到一个新名词——“视频相亲”。在福清地区，由于年轻人都外出谋生，留在家乡的比较少，结婚对象的选择余地自然也比较小。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视频相亲”流行开来。那么，究竟是网络的发展推动了新的“相亲模式”，还是其他因素促使“视频相亲”的出现呢？在南非期间，笔者向受访者询问这一现象。

“在我们福清地区，基本上没有年轻人会留在老家发展，各家各户都有亲戚在国外，都会找路子出来。很多男孩子初中毕业就出国了。在国外，如果没有工作证或居留证，要回国很麻烦。我们那里的人结婚比较早，如果没有读大学，到了20岁左右，家里人就会催着结婚。但是，回国一次很不容易啊，南非这边的移民局查得很严，经常要找人麻烦，而且回国还会耽误南非这边的生意，所以大家不会轻易回国去。”^[29]

“视频相亲很方便呀，通过视频看一下，如果双方觉得对方长相不错，又谈得来，那就可以了。当然，这视频相亲的前提是家人介绍的，一般家长都会事先了解一下对方的底细，所以成功率还挺高的。”^[30]

非法偷渡、网络普及加上传统文化下的父母之言，共同促成了“视频相亲”这一新现象的出现。这也反映了在中国新移民群体中，其通婚对象主要还是局限于华人圈子，或者熟人圈子。而在南非华人最大的同乡会——福建同乡会的调查中，秘书长也向笔者证实，新移民与当地人的通婚确实很少，他甚至想不起究竟有没有这种现象。因为“中国人跟当地人的家庭观念很不一样，南非人婚后实行财产独立，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这种观念”。^[31]

在南非生活的新移民，他们在异域体验了不同的家庭观念、人际关系模式后，感受到的是一种断裂感。在与当地人交往的实践过程中，时刻被跨国迁移的衍生物——文化冲突提醒他们作为迁移者的模糊、不确定角色。因此，在婚姻与交往对象的选择中，新移民还是普遍选择熟悉的圈子。

四、余论：隔阂依旧

跨国流动将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推拉到朝夕相处的同一生活情境中，而且移民族群往往相对集中于某一经济领域，并因相似的生活习性而相对聚居，故而更有可能凸显其社会差异性。

中国新移民在南非所处的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社交圈子及周边环境是一个介乎同质与异质之间的社会空间。中国新移民群体的同质性强，其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由于中华文化的熏陶，新移民在语言使用、家庭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同质性。其次，中国新移民群体具有小集团性质。大部分中国新移民是借助构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之上的移民网络而迁移到南非的，因此，这种格局使中国新移民以亲缘、地缘为纽带，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小集团。他们能从小集团中获得物质帮助、精神支持和情感满足。这导致新移民群体相对疏于与南非当地的民众进行社会交往，并与他们存在隔阂。

同质性强的中国新移民身处介于同质与异质之间的社会空间，因而集体遭遇到了文化隔阂所带来的无所适从。所谓异质是指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与移民所习得或持有的一整套规范相异。新移民群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即使移居南非，仍然保持着中华文化最内核的价值观念，诸如财产继承、传宗接代等。他们与南非人在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处理和亲族网络的维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如果说对新的文化现象的辨识、理解或接受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对于长期缺少沟通所产生的“文化冲突”来说，可能就需要更长期的充分深入的沟通和理解才能克服。对一个新的文化的适应，需要从了解、沟通、理解到适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南非的中国新移民群体约有 30 万人，对人口将近 5000 万人的南非而言，显然是个少数民族群。中国人强烈的家乡认同使得很多人并不把南非当作久留之地，在言谈之间，他们倾向于强调中国人的“异质”和“客居者”的身份。“我们是中国人，以后还是要回中国去的。南非毕竟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这里只是工作、挣钱的地方而已。”这是众多受访者对中国、对南非的心声写照。由于对南非没有归属感，使得他们在融入当地文化方面不愿做太多努力，导致他们在南非主流文化中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华人在南非主流社会中完全没有影响力，哪怕在侨界看来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南非社会中也未必就能引起一点反响。”^[32]移居南非多年的记者梁先生这么说。这种对移居国主流文化的陌生与隔阂而带来的边缘化地位，更是强化了新移民对中国、对故乡的思念与怀念。很多新移民在还完因移民所欠下的债务后，便把钱寄回家乡，让留守在家的亲人去修建房子。侨乡地区那一幢幢豪华的别墅，既是新移民异域奋斗成功的象征，也是他们文化认同的表现。对大部分新移民而言，熟悉的地方——中国、家乡，才是承载他们荣耀与归属的地方。

中国人移民南非的历史与其他地方相比并不悠久，新移民在此并无太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积淀，其文化适应策略具有与其他传统移民国家不一样的特点。文化的差异以及这种功利主义的“过客”适应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长远发展。当然，随着新移民在南非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逐渐适应，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也会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其适应策略。南非华人社会内部多元分化明显，从原籍地、教育修养、经济利益、政治认同到宗教信仰等，都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中国新移民群体在南非的发展状况，未来还应进行分层的深入研究。

[注释]

[1] 李明欢 《欧洲国际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 [2] 李明欢 《东欧社会转型与东欧新华商群体的形成》，《世界民族》2003 年第 2 期。
- [3] 庄国土 《对近 20 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 [4] 庄国土 《从跳船者到东百老汇大街的“主人”——近 20 年来福州人移民美国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 [5] 张秀明 《国际移民体系中的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 [6] 黄润龙 《我国海外华人的分布及发展》，《人口学刊》1997 年第 1 期。
- [7] 郭玉聪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新移民》，《当代亚太》2004 年第 9 期。
- [8]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32 页。
- [9] 苏国勋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上）》，《国外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
- [10] 万晓宏 《南非华人现状分析》，《八桂侨刊》2007 年第 1 期。
- [11] 访谈陈先生（南非福建同乡会秘书长），2011 年 1 月 17 日，于约翰内斯堡福建同乡会馆。
- [12]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8 页。
- [13] 访谈林先生（批发店老板，到南非 7 年），2011 年 1 月 5 日，于约翰内斯堡香港城。
- [14] 访谈曾先生（批发店老板，到南非 14 年），2010 年 12 月 7 日，于约翰内斯堡百家商城。
- [15] 陈向明 《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5 页。
- [16] 访谈陈先生（零售店老板，到南非 11 年），2010 年 12 月 22 日，于约翰内斯堡香港城。
- [17] [18] 访谈林先生（零售店老板，到南非 7 年），2010 年 12 月 28 日，于约翰内斯堡百家商城。
- [19] 访谈曾先生（批发店老板，到南非 14 年），2010 年 12 月 7 日，于约翰内斯堡百家商城。
- [20] 访谈林先生（批发店老板，到南非 7 年），2011 年 1 月 5 日，于约翰内斯堡香港城。
- [21] 访谈南非人 Johan（香港城保安），2010 年 12 月 22 日，于约翰内斯堡香港城。
- [22] 访谈印度裔南非人 Leon（香港城员工），2010 年 12 月 22 日，于约翰内斯堡香港城。
- [23] 国务院侨办网站，<http://www.gqb.gov.cn/news/2010/1019/20842.shtml>。
- [24] 访谈陈先生（零售店老板，到南非 11 年），2010 年 12 月 22 日，于约翰内斯堡香港城。
- [25] 访谈曾先生（批发店老板，到南非 14 年），2010 年 12 月 7 日，于约翰内斯堡百家商城。
- [26] 访谈林先生（零售店老板，到南非 5 年），2010 年 8 月 5 日，于福清市江阴镇。
- [27] 访谈曾先生（批发店老板，到南非 14 年），2010 年 12 月 7 日，于约翰内斯堡百家商城。
- [28] 访谈南非人 Clinton（华人店铺员工），2011 年 12 月 28 日，于约翰内斯堡香港城。
- [29] 访谈陈先生（零售店老板，到南非 11 年），2010 年 12 月 22 日，于约翰内斯堡香港城。
- [30] 访谈严先生（在福清卖机票），2010 年 8 月 5 日，于福清市江阴镇。
- [31] 访谈陈先生（南非福建同乡会秘书长），2011 年 1 月 17 日，于约翰内斯堡福建同乡会馆。
- [32] 访谈梁先生（某华文报社记者），2011 年 1 月 21 日，于其家中。